本书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对社会公共领域有重要直接影响力的学者及他们的思想。但即使作为通俗作品来衡量，本书中作者的一些观点仍有着较大的缺陷。作者最大不足应该是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上有明显的偏差，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有失真之处。

这一问题首先表现在“现代性”上，作者对古今之变的基本判断，是理性在其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不能说理性的主导地位是前无古人或者说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与“前现代”时期截然不同的。包括作者所举的关于“古今之变”的例子，都带有一种将“前现代”与“现代”黑白两分的简单倾向。实际上，无论是“理性主义”也好，还是“个人主义”的特点，在西方问民的古典时期甚至中世纪时期并非完全不存在，甚至也有过高潮，如古希腊哲学的高峰阶段，“现代性”与其说是发现了什么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不如说是发现原来已有的，但当时其作用还不那么明显的那些理念，的巨大潜藏价值并加以更完全的开发。作者在书中的叙述不免误人子弟。

另一个问题也与之相关，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许多。无论是医学、法律制度还是哲学思想上看，早期的文明都呈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倾向，这大概就是为何作者会说古代的东西方文明都是“集体主义”的。但是这种共通性仅仅是就文明最古老，分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来看。如果将泛希腊化时代到罗马帝国时期的西方与秦汉后的中国相比较，会发现处在相对较高发展状态后的东西文明有了不同的取向。无论是斯多葛哲学还是伊比鸠鲁主义，占据古典时代西方主流的思想，比之于中国的儒学来说，其“个人主义”的意味要浓厚一些，而“集体主义”则要淡不少。同时在政治制度上，这种差异也很显著，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制对于西方文明几乎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词汇，而却是中国秦朝以来的政治实情。单独说“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其实都太模糊、太笼统，因为即使是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可以被视为“个人主义”的思想，如孔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过与其说这是作者个人的不足，毋宁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因为现代性目前仍只是西方文明的独角戏，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免从西方文明特有的视角出发。

与彼得·沃森的《二十世纪思想史》相比，本书聚焦的人物更有限，而通俗性也更好，作者更加关注学者思想的实践应用，如何与一般读者的生活相联系，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努力确有成效。这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思想的某种特征：那些更宏大的、关乎宇宙本源，人类理性的“基本问题”，或者被证明为此路不通，或者是前人的成果暂时没有超越的希望，二十世纪以来的思想更多的将重心放在了社会实践的地方。现代的思想者们做的不少工作，实际上还是对早已被发现的重要理论的细化或者移植到新时代的条件中。令人心潮澎湃、思想激荡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今人只在做缝缝补补的零碎工作，既是对前人功绩的肯定，也是后来者的无奈。